

1326

中国现代史

主 编
陈崇钊 张立芳 主编

第(下) 册

中国现代史学会

主 编 陈崇钊
主 编 张立芳
主 编 张立芳 陈崇钊

天津教育出版社

中国现代史

陈崇钊 张立芳 主编

(下)

天津教育出版社

中国现代史(上下)

陈崇钊 张立芳主编

•

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湖北路27号)

山东省栖霞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8 字数400,000

1989年9月天津第1版 1989年5月栖霞第1次印刷

印数1—7,900册

ISBN 7-5309-0785-9/K·15

定价: 6.50元(上、下册)

第一章

全民族奋起抗战 两个战场的出现

第一节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

一、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15公里处的宛平县卢沟桥挑起事端，发动侵华战争，中国驻军奋起反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侵略华北、乃至全中国的又一关键步骤，它为此作了长期准备。早在1936年上半年，日本即开始向华北大量增兵。驻华北的日军由原来的5000人增加到2.5万人，并改天津驻屯军为华北驻屯军，在天津设立司令部，作为日本侵略华北的最高军事机关。同年5月，日军在古北口等处建筑炮台，并在北宁路沿线驻扎重兵。9月，日军强占了交通要道丰台车站。10月，华北驻屯军万余人在平津地区举行了一次以攻取北平为假想目标的大规模军事演习。1937年春，日军在华北的军事演习更加频繁。5、6月间，驻丰台日军每隔三五天即在丰台至卢沟桥地区演习一次，阴谋制造借口，挑起战端。

7月7日晚，日军一个中队又在卢沟桥地区进行荷枪实弹的军事演习。10时许，演习完毕。此时，宛平城东方突然

鸣枪数响，日军立即对宛平城取包围攻击之势，以丢失一名士兵为借口，要求入城搜查。驻宛平城的第二十九军二一九团第三营营长金振中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日军即鸣枪示威。冀察当局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同日方商定，由中日双方派员前往宛平城调查。8日4时许，当双方代表正在谈判间，日军突然向宛平城开枪开炮，发起攻击。中国军队忍无可忍，奋起反击，多次打退日军的进攻。日军在增援后，轮番向卢沟桥阵地冲击，二一九团官兵英勇顽强，奋力拼杀，营长金振中、团长吉星文先后负伤，仍坚守阵地。

卢沟桥的炮声，震醒了中华民族，出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新形势。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9日，中国工农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致电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员进行抗日斗争，并代表红军战士请缨杀敌。

卢沟桥抗战牵动着每个炎黄子孙的心。北平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及各界爱国人士迅速行动起来，掀起了支援二十九军抗战的热潮。全国各地的声援电、慰问品、慰问信纷纷送到平津前线，给二十九军广大官兵以极大鼓舞。

国民政府对事变作出了积极反应。8日至10日，蒋介石连电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令固守宛平城，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令宋往保定指挥，限期完成国防线工事。同时，密令部分军队迅速向石家庄、保定集中，支援二十九军抗战。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日军立即

停止军事行动。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了对日态度交为强硬的讲话，提出了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项条件，指出：“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他表示，决不允许把北平变成第二个沈阳。“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蒋介石的讲话，表明国民政府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因此，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欢迎。日军在卢沟桥的进攻受挫后，又玩弄假谈判真大战的把戏。一面在北平与冀察当局谈判，声言就地和平解决争端；一面迅速调动大军，部署平津间的大战。宋哲元等人在抗战问题上动摇不定，往返于平津间与日方接触，向侵略者乞求和平。蒋介石虽准备抗战，但仍未放弃和平的幻想，希望由冀察地方当局与日本谈判解决争端。同时，他还把希望寄托在列强的干涉上，先后召见英、美、法、德驻华使节，请求其政府调停中日冲突。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冀察当局忙于同日方谈判，放松了对日军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准备。

日本利用“和谈”作掩护，从中国东北、朝鲜和日本国内抽调重兵增援华北，平津间的日军迅速增至5个师团，约计10万人。20日，日军在北平四郊发动攻势，炮击宛平城、长辛店等地。26日攻占廊坊，切断了平津间的交通。同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驻守卢沟桥及北平各地的二十九军必须于28日完全撤退，否则日军将自由行动。日军不等中国方面答复，即开始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宋哲元拒绝了日方通牒，通电全国，表示尽力“自卫守土”。28日，二十九军开始反击，中日双方军队在北平外

围展开激战。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在指挥南苑保卫战时壮烈殉国，中国军队伤亡惨重。当日晚，宋哲元奉蒋介石命令率所部撤往保定，29日，北平失陷。同日，二十九军驻天津部队在重创日军后也南撤，30日，天津沦陷。

“七七”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端。中国军队的奋勇抵抗，揭开了全国性抗战的序幕。从此，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进入了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抗日战争时期。

二、“八一三”上海抗战

日军在侵占平津的时候，日本参谋本部于7月29日制定了《对华作战计划大纲》，决定在击败平津地区中国军队的同时，以一部兵力在青岛、上海附近作战。日本的意图是，一方面，通过开辟华东战场，配合华北的作战，以钳制中国军队主力，使其不能增援华北；另一方面，占领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威逼中国首都南京，控制富饶的江浙地区，压迫国民政府屈服，以实现其“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方针。

8月初，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已在上海作好了相应的作战准备。6日，上海的日侨按照日本政府的训令撤至上海日租界内。斯时，日军在上海一再挑衅，制造战争借口。9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率一名水兵，驾驶汽车强行冲击虹桥中国军用飞机场，被机场卫兵当场击毙。日本即以此为借口，乘机扩大事态，要求中国政府撤退驻上海的保安部队及拆除所有的防御工事。当这一无理要求被中国政府拒绝后，日本即迅速向上海调集部队，准备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

国民政府意识到战争已不可避免，乃进行紧急军事部

署。由于受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的限制，上海市区仅有少量的保安部队。从8月上旬开始，蒋介石陆续将驻苏州、无锡、常熟一带的第五军的两个师秘密调到上海，又命令5个师和1个旅的部队向上海附近集中。委任第五军军长张治中为京沪警备司令官，统一指挥上海的战事。同时，下令封锁长江，以应付日军可能发动的进攻。8月12日，国民政府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商决抗战大计，决定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作为抗战最高统帅部，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为了加强具体的军事指挥，随后，军委会在前线省份划分了4个战区，上海属第三战区，由冯玉祥任司令长官。

8月13日，日军以日租界和黄浦江上的日舰为基地，炮轰闸北一带，并在重炮和坦克的掩护下，向闸北、虹口、江湾等地的中国驻军大举进攻。守军奋起抵抗，八一三上海抗战拉开战幕。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布中国为日本无止境的侵略所逼迫，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15日，蒋介石下达了总动员令。这说明国民政府已走上了自卫抗战的道路。

为了保卫上海，国民政府军委会先后调集了1/2以上的第一线兵力用于淞沪战场，陆续参战的部队达70个师，50余万人。日本也多次增兵上海，先后投入了12个师团及海空军、特种兵部队近30万人。中日双方军队在淞沪地区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的大血战。

上海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发起攻势作战，将日军压迫至黄浦江边狭长的阵地上。年轻的中国空军亦投入战斗，猛烈轰炸虹口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和汇山码头等日军阵地，并炸伤日舰“出云号”，击落敌机多架。日军无力抵挡中国军队的

攻势，不得不向国内求援。

8月15日，日本编组了上海派遣军，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增援上海。23日，日军在吴淞、川沙强行登陆。中国军队遂与登陆日军在宝山、月浦、罗店、浏河一带进行阵地攻防战。尤以罗店的争夺战最为激烈，敌我双方屡进屡退作拉锯战，鏖战月余，全镇毁于炮火，成为一片焦土，中日双方军队伤亡都极为惨重。宝山县城守军姚子青营，在日军优势兵力的猛攻之下，坚守阵地，与敌血战两昼夜，500余名官兵全部壮烈殉国。由于日军再度增兵，加强攻势，至9月中旬，中国军队退守北站、庙行、浏河一线，与敌对峙。9月21日，军委会调整第三战区指挥系统，由蒋介石亲自兼任战区司令长官，并从各地抽调部队增援上海。从9月24日开始，日军向中国军队阵地发起全线攻击。守军英勇抵抗，但由于伤亡过重，不得不节节后退。10月初，陈诚接替张治中，任前敌总指挥，负责指挥淞沪战事。10月21日，中国军队为恢复原来阵地，进行全线反攻，但未能奏效。25日，日军突破守军大场防线。大场失守，使闸北、江湾、庙行一线的中国军队侧背受到威胁，守军被迫向苏州河南岸撤退。五二四团副团长谢晋元率一营兵力扼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阵地，掩护主力部队撤退。27日，日军以优势兵力，在炮火的掩护下，猛扑守军阵地。谢晋元率全营“八百壮士”与敌血战四昼夜，歼敌200余名，然后奉命撤入英租界。此后，日军多次强渡苏州河，但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进展不大。

日军长期胶着上海，不利其扩大战果。为了尽快占领上海，10月20日，日本参谋本部决定编组第十军，辖三个师团及部分特种兵部队，任务是在杭州湾北岸登陆，协助上海派遣

军作战。由于中国军队在杭州湾北岸的兵力薄弱，11月5日，日军第十军在杭州湾北岸全公亭和金山卫登陆成功，并于9日攻占淞江。为避免中国军队的后路被截断，蒋介石于11月9日下令淞沪全线撤退。12日，日军占领上海。淞沪会战至此结束。

上海抗战坚持了三个月之久，毙伤日军5万余人，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粉碎了其“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中国军队广大官兵所表现出来的顽强战斗，不怕牺牲，为祖国而献身的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抗战决心和能力，极大地鼓舞了全国的民心士气。这次抗战，也为京沪等地及沿海沿江工厂、学校、机关的内迁，争取到了必要时间。但是，由于中国统帅部战略方针的错误及作战指挥上的失误，使中国付出了重大代价，军队伤亡近20万人。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因此，迅速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抵抗日本侵略，就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接连不断地向国民党进行谈判，为促成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如前所述，西安事变后，从1937年2月至6月中旬，中国共产党曾派出代表，与国民党代表进行了多次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国民党方面虽在原则上同意国共合作抗日，但在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红军改编和陕甘宁边区的地位问题上，对共产党进行种种限制，致使谈判未能在关键性的问

题上达成协议。全面抗战的爆发，推动了国共两党谈判的进程。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决定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再与国民党谈判，并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7月15日，周恩来在庐山将《宣言》面交蒋介石。《宣言》强调：“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宣言提出了抗日的三项基本主张和总的奋斗目标，即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实现民权政治；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同时，中共中央郑重声明：愿为彻底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策；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特区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7月17日，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以上述宣言为基础，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在庐山举行会谈。蒋介石虽承认了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但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系统、陕甘宁边区的人事安排等问题，仍坚持无理要求。8月上旬，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应邀到南京出席国防最高会议。会议期间，与蒋介石等就发表中共宣言、红军改编事宜等问题继续进行商谈。这时，由于八一三事变的爆发和华北战局日益紧张，蒋介石急切希望红军早日出师作战，以牵制日军，被迫同意了中共关于红军改编的主张。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8日改称第十八集团军）。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命令，任命朱德为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下辖

三个师，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一二〇师师长贺龙、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全军编制 4.5 万人。同日，朱德、彭德怀通电就职。9 月 6 日，陕北苏维埃政府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承为政府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

9 月 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延搁两个多月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 日，蒋介石就中共宣言发表谈话，他虽然把同共产党的合作说成是“政府接纳共产党”，但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中共《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0 月 2 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南方 8 省 13 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中共中央提名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副主任。后来，国民政府军委会一一照委。新四军下辖 4 个支队，全军共 1 万余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实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结果，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开始了全国各族人民、各抗日阶级、阶层、党派团结抗战的新局面，为抗日救国事业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指出：“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①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335 页。

四、中间集团的抗战主张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和地方实力派的中间集团，纷纷提出了许多抗日政治主张。他们拥护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要求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并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斗争，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首先，他们主张动员全国民众，实行全面抗战。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即7月10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致电国民政府，提出八大政治主张。要求“提前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全国一致遵守的政治纲领”；“实现最低限度之民主政治，……使人民得以自由发挥其抗战能力”；“成立武装民众指导之机构”^①。同日，全国各界救国会发表《为保卫北方紧急宣言》，呼吁全国同胞全力保卫北方，支援二十九军抗战，并强调指出，人民“是抗战御侮最基本最伟大的力量”^②，因此必须组织人民，给人民以抗日活动的自由。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向日本帝国主义冲锋。中国青年党也发表宣言，提出“厉行全国总动员，加强抗战力量”^③。全国抗敌救亡总会提出，要“立刻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组织、训练并武装广大的民众，增加现有军队，扩大游击战争，展开真正的全民抗战”^④。施复亮在《怎样争取最后胜利》一文中指出，“民众是抗战的主体，民众是一切抗战力量的源泉”，政府只有以民众为基础，才

①《抗战行动》第五期特大号，1938年3月29日出版。

②《救国时报》1937年9月18日。

③《中国青年党》第2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④张执一，《抗战中的政党和派别》，1938年。

是抗战胜利的“根本条件”^①。

其次，中间党派主张开放政治，实行抗战民主。他们把民主与抗战联系起来，认为中国如不实行民主，给民众以救国的言论自由、组织救国队伍和进行救国活动的自由，那么，抗战时期的任何其他问题“必都不能圆满解决”。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八条政治主张中提出，“从速开释全国政治犯，并取消以前有碍民众运动之各项特殊条例”。他们指出，为了动员民众，支持抗战达到最后的胜利，必须整饬政府机构。“肃清一切贪污无用的分子，彻底改造政治机构，以适应战时的机能”^②。他们要求国民党应允许在野党派合法，给他们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保卫祖国的自由。

再次，中间党派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全国抗敌救亡总会提出，要“加强全国的团结，巩固全民族的统一战线”^③。陈铭枢在《巩固统一抗战到底》一文中指出，“当前抗战到底的先决条件，是尽可能的多方的设法巩固统一”^④。

中间党派不仅提出了许多有利于抗战的主张，而且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活动。在抗战初期，他们在宣传群众，动员抗战，培训抗日干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发挥自己的优势，创办了许多宣传抗日救国的报刊，并进行募捐支前，慰劳前方抗战将士，救济灾民等工作。此外，中间党派的许多成员还

①《文化战线创刊号》，1937年9月1日。

②《大公报》社论《今年的国庆》1937年10月10日。

③④张执一，《抗战中的政党和派别》，1938年。

直接到前线参加抗战。有的到正面战场参战；有的进入华北、陕北和华中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有的到农村组织游击队，同日军作战。

中间党派的上述政治主张和活动，对于抗日和民主运动，都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抗战初期，由于国民党不仅在口头上表示抗日，而且在行动上对日作战也比较努力，并且在政治上也开放了一些民主，这就使中间党派的许多人对蒋介石产生了很大幻想。他们一致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战，存在着一种单纯依赖国民党和政府抗战的错误倾向。陈铭枢声称：“国民党已经居于唯一领导抗日的地位”。只有“统一一切思想、意志、政见，集中一切人力、财力、智力于中央，且掌握于最高领袖之下，……方能胜敌图功”^①。有人还提出：“领导抗战者，只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一个主义，除此皆不能取得合法之存在”^②。刚出狱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章乃器，还提出了“少号召，多建议”的错误口号，认为其他党派只能对国民党及其政府提提建议，不能独立自主地号召和发动人民起来抗日。他要人们“多信托一些政府”，“信任舵师”。1937年10月，李济深、陈铭枢等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大同盟”自动解散，以表示“拥护政府”，“增强全民族团结”。中间党派的上述错误观点，在客观上有利于国民党推行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而不利广泛动员民众，实行全面抗战。以后，随着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政策的实施，中间党派逐渐抛弃了对国民

①（陈铭枢，《抗战中之党派问题》，《抗战文选》第二辑，1938年5月。

②（《新民报》社评，《今后的党派问题》，1938年4月28日。

党蒋介石的幻想，开始靠拢共产党所代表的革命和进步势力。

五、国际上对中国抗战的不同态度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大规模侵华战争，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及各国的关注。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基于不同的目的，对中国抗战采取不相同的态度和政策。

社会主义的苏联奉行维护世界和平和反对侵略战争的外交政策，从道义上、物质上积极援助中国抗战。卢沟桥事变发生后，7月14日，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在接见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时表示，“苏联愿助中国”。8月21日，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是在外交上对中国的有力支持，也是对日本侵略行为的沉重打击。在11月召开的以九国公约签字国为主的布鲁塞尔会议上，苏联代表李维诺夫申张正义，坚决主张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苏联舆论界强烈谴责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同情和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战。同时，苏联还以提供军事物资、军事顾问和飞行员的实际行动支援中国抗战。1938年，苏联政府两次向中国贷款1亿美元，次年，又贷给中国1.5亿美元。到1940年底，苏联共向中国贷款4.5亿美元。这些贷款，不附带任何条件和抵押，充作贷款的是中国急需的战争物资，而这些物资的折价比市价还低20%。仅从1937年10月至1939年9月的两年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985架飞机、82辆坦克、1300多门大炮、1400多挺机枪以及大批弹药、运输工具和燃料。此外，苏联政府派遣了以崔可夫为首的由大批军事专家组成的顾问团赴华，帮助中国作战和培训军官。还先后派遣了1000多架飞机和2000多人的航空志愿队到中国直接参战，和中国军民共同抗击日

本侵略者，给日本空中强盗以沉重打击。苏联飞行员有近200人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其中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战斗机大队长赫曼诺夫。他们为中国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得到了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爱好和平人民的广泛同情和大力支持。抗战爆发后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发表了告国际无产阶级的宣言，号召各国工人阶级和一切真正拥护民主、和平的人士，在政治上、精神和物质上支持和援助中国。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工人阶级和各界人民纷纷举行集会、示威、游行，发表宣言、通电，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战。他们还通过募捐、抵制和拒运日货等方式，来表示对中国抗战的支援。还有一些国家的志愿人员直接到中国参加战斗，如以白求恩为首的由加拿大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有柯棣华参加的印度医疗队，他们为中国抗战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世界上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抗战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两种。德国和意大利两个法西斯国家是日本的同伙，支持日本侵略中国。1937年11月，意大利加入《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正式形成三国同盟。它们在东西方同时发动侵略战争，遥相互应，互相配合。德国不仅向日本提供军火援助，而且极力劝诱国民政府向日本投降。意大利则在国际会议上公然为日本侵华辩护。

英、美帝国主义对中日战争的态度同德、意不同，它们采取所谓“中立”、“不干涉”的两面政策。抗战初期，英、美为了保住自己的在华利益，对日本采取绥靖主义政策。7月11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下院报告说：“日本及其他各国政府